

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

——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牛庆燕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摘要]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精神气质;道德信念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7)03-0030-(0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宗教信仰的精神原素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的探讨,从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思维探寻路径,即精神动力原素潜移默化地熏陶渐染于人的思想层面,进而引导人的行动,促使人的行为达到现世的价值目标,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韦伯采用“理想类型”的逻辑方法完成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所必备的现代化精神动力机制问题的探究,这种发源于人们内心价值信仰的精神动力原素,即是新教伦理所勃发而彰显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并且,“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关系”。^[1]因此,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性类型”特质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动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

资源,并对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社会伦理文化的价值因子和道德价值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韦伯命题的“新教伦理精神”设计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详尽探讨了新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逐渐凸显了基于“救赎论”而存在的“财富观念”和在“时间观念”基础上建构的“天职观”和“命定论”,确立了世俗生活的宗教道德意义和玄思性质的神圣意境,潜在地重塑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巨大发展的新教伦理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2]^[174]宗教改革后以一种新教的伦理姿态赋予虔信新教伦理教义的普世民众独特的内在精神气质,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性经济行为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准备了“谋利的冲动”与“禁欲道德信条”辩证契合的合理宗教诠释,它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依循的宗教文化内核,同时也彰显了资本主义发展所

[收稿日期] 2007-01-23

[作者简介] 牛庆燕(1978-),女,山东泰安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潜在的精神动力诸原素所达成的合理“生态”。

韦伯的新教伦理倡导世人服从上帝的意旨,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踏实劳作,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从而获得拯救。“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人须衡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并且一切劳动与职业分工安排都得益于上帝的命令,“主张从劳动分工的成效来洞悉上帝作如此安排的目的”,“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个人依靠辛勤劳动在尘世生活中谋求社会财富是每个人自身神圣的“天职”所在,个人为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新教伦理理念指导下个体职业道德的高尚程度,目的是为荣耀作为终极实体的上帝,为个人来生获得“救赎”提供一定重量的砝码,于是,个体世俗生活中的行动因具有了宗教道德的意义而体现出神圣的价值。

同时,“你须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尘世生活中个体为社会创造和积累财富是为履行天职,绝对禁绝个体的贪婪欲念,唯有克己禁欲才是新教徒向往上帝灵光的理性归依。“新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3]72}“这种禁欲主义与许多流行的想法相反,目的是使人过一种警醒而睿智的生活:最现实的任务是使信徒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最重要的手段是使其行为秩序化。”^{[2]119}因而,新教伦理号召世俗中人听从上帝的神意安排克己禁欲,依靠谋利的经济冲动力为社会积聚财富,以此作为自身的神圣“天职”以荣耀上帝,如此,禁欲的道德价值理念与谋利冲动的无限追求在新教的伦理视野中辩证契合复归,这样,整个社会便逐步呈现出合理化的经济发展秩序,神圣的禁欲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谋利冲动的合理“生态”促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新教伦理精神依靠一种宗教的信仰,借助于彼岸世界的上帝实体存在的力量,完成了尘世生活中财富积聚的合理化诠释,为世俗社会中人们谋利的动机和意图提供了宗教神学的“天职”证明,为获得“拯救”就要在现世的有限生命时段里服从上帝、荣耀上帝,从而为“谋利冲动”提供了合法化的阐释,这种谋利冲动对“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作用”。^{[3]72}所以,个人现世人生的恪尽天职、辛勤劳作以及克己禁

欲的努力为个体准备了世俗生活理性化的途径,新教徒今生此岸世界的入世劳作是为来生超验彼岸世界的上帝拯救开辟渠道。路德宗教维新后,宗教教义为每位皈依者提供了平等的与上帝沟通的机会,无需通过教会和圣事的中间环节向上帝忏悔,只需依靠个体虔诚的内心宗教信仰和与天国圣灵的感通而与上帝交流,这是西方新教伦理文化的可贵之处。虔信新教的独立个体依靠自身理性之光的精神动力指引克服了单纯感性情感的偏颇,恪尽天职与克己禁欲的价值信念在新教徒的思想中挺拔不摧,指引着其用自身整个一生的勤勉付出为上帝增加荣耀,谋取财富,并且自始至终与上帝对自身的理性规定和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禁欲勤勉节俭是自身在尘世生活中的“天职”,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获得灵魂的来生“得救”。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辉煌注入了宗教伦理的动因和神圣性的价值依托。

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预设了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价值理想类型,他用宗教式的伦理设计倡导勤勉节俭的德性伦理精神和恪尽天职的工作伦理情怀,为世俗谋利创获财富的行为提供了宗教神旨的价值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阐释,因而,尘世向往“拯救”通途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拥有了道德善的价值内涵,其充满宗教道德信仰原素的伦理精神为世俗众生提供了精神价值信念的激励机制,为尘世生活中谋利的行为动机和意图进行着价值合理性的证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备的普遍价值理性和动力支持。与此同时,依循天职使命所进行的谋利行动要以一种绝对理性的符合社会规约的方式进行,禁绝为己的膨胀贪欲,以节俭禁欲的理性精神在现世成为上帝的“选民”从而在超验的彼岸世界获得灵魂的得救。因此,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以一种宗教道德的方式,引导尘世生活超越了物质财富创造本身并赋予其世俗生活伦理责任的道德内涵。新教伦理精神一方面提供了谋利冲动力的合理证明,另一方面又为新教徒的克己禁欲准备了宗教诠释的合法性依据,正当谋利与合理节俭的俗世行为在韦伯“新教伦理精神”中达到了圆满契合,共同构成了驱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新教伦理所成就的资本主义精神适用于具有宗教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韦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理想类型”理论试图掩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殖民扩张与资本掠夺的可能性。这种“理想类型”理论充分彰显了欧洲中心主义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文

化优越论。樊浩教授指出:“潜在于韦伯‘理想类型’中的深刻矛盾,是道德哲学的逻辑取向与历史哲学的实践取向的双重向度与二元分离”,“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文明形态与民族存在,‘理想类型’却将西方准确地说西欧的特殊文明,泛化为一切文明的理想范型乃至唯一合理的范型,以之解释和评判其他一切文明形态,从而建立了一个有悖于韦伯自己极力倡导的理性主义的专断的、具有明显文明专制色彩的普遍性。”^[4]从而在理论学术界塑造并渗透了一种文化价值信念上的“强势”与“霸权”,凸显了一种文化优越主义甚至民族优越论,不利于现代化历史视野中多元文化的融通共进。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并非优越于其他民族文化精神价值,但从中吸取道德价值精神动力内核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紧迫性。“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文化印记,在为资本主义产业文明作道德价值辩护与合理性说明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伦理信念支撑的“原初图示”,因此,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撷取“新教伦理精神”理念的合理价值内核,从而努力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建设。

二、现代化际遇下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

在宗教信仰的精神信念进一步“祛魅化”的今天,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使得新教伦理的理念链条在非新教信仰的国家发生了“力”的断裂,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透过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从中得到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价值信念启示。

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虽然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独特的内在精神气质,但在现代文化场域中建构符合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类型”,就应当借鉴韦伯新教伦理文化所具有的合理价值内核,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注入伦理价值理念的有机因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类型”提供价值合理性的证明,同时也为经济运行准备道德理想信念的理论依托,使市场经济的利益动机与道德价值信念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中达至辩证契合。透过韦伯“新教伦理”的价值内核,我们应当力图把握其理性经济生活的道德信念支持并探寻精神价值意义世界的真谛,合理调整物质欲求与价值追求的“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建构和谐社会的

伦理—经济文化桥梁,从而实现物质欲求与德性需求的辩证融合。

(一)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运作的道德信念支持,需要合理兼顾世俗物质欲望与精神价值需求

韦伯的“理想类型”一方面成就了世俗生活中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为创获财富的行动提供了不屈的精神动力和合理性与合法性兼备的道德证明,另一方面又为现实人生的克己禁欲准备了宗教来世“得救”的崇高价值信念,于是,伦理价值信念与物质财富的本性欲求,“道德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冲突在韦伯新教伦理精神中得到了辩证契合。伦理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原素既承载着人们物质财富需求的冲动,同时更体现着对经济运作的精神价值理念的道德规约,因此,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要在充分肯定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求的基础之上,运用伦理道德的人生智慧信条进行价值规约,整合自然冲动欲求与伦理冲动机制,赋予经济行为以一定的价值规导,体现价值合理性与伦理现实性。因而,“伦理精神必须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效力,合理性的价值根据是对‘德’的追求,现实效力的世俗基础是对‘得’的假设与承诺。”^[5]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的伦理文化设计理念一般仅从对世人的单一的“德”的养成上下功夫,而远远忽视了对人们俗世生活中“得”的假设和承诺,如此,个体合理的自然欲求与社会伦理价值理念的导引之间的“自然融通”链条发生了“力”的断裂,伦理秩序的期盼因失却了现实的基本物质“得”的依托从而呈现出虚幻性,这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的道德信念激励机制不能产生长久的普遍效用的关键所在。韦伯的伦理命题克服了此种弊端,高度统合了自然欲求世界的物质需要与精神意义世界的价值提升,因而,要为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提供伦理文化的道德激励机制,便不能否认世俗生活世界的合理物质欲求,而是在肯定经济冲动力的理性前提下阐释道德的理论合理性与现实的实现机制,整合社会伦理精神机制并提供深层的道德实践理性规约。由于世俗生活的物质利益获“得”的内心体验存在其“持续有限性”,便进一步凸显了道德精神价值的可贵性,道德信念的价值支撑依靠一种文化意义的阐释系统引导着经济运行统合精神与欲求、价值与理性的关系内核,范导人们依靠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践行伦理的精神价值规约,达至个体内在生命秩序与外在社会生活秩序良性互动的和谐“价值生态”。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建立“德—得”相通的道德回报机制与伦理价值运作模式,为“善”的道德价值信念的落实提供客观公正的制度保证

韦伯以一种理论的反思建构了新教伦理所成就的“理想类型”,在此种文化意义世界中,“上帝救赎”的宗教伦理信念向世俗生活世界落实,并逐步具备了世俗的价值功用,尘世中人依靠对上帝的价值信念辛勤劳作,有“德”同样可望在来世有“福”,进入天堂,摆脱苦难,并进而在现实社会逐步得到制度规约性的认可,宗教道德的虔诚信念的“德”推动人的行动合理化获得来生“得救”的“得”的回报,同样给现代社会以借鉴意义。

道德的修为是具有理性意识情感的人类所应当拥有的内在秉性,道德实践的推行是伦理道德法则的获“得”与实践物质利益的合理“得”到,是精神价值上的赞许肯定与物质利益需求的适度满足的辩证契合。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以一种来生彼岸世界的灵魂得救的价值信念并凭借克己禁欲与勤勉劳作的“天职”信条实现了“德—得”融通,物质财富的获“得”与来生精神价值上的“获救”“得”到充分彰显。在现实社会经济运作过程中唯有获得道德实践的价值回报的客观制度机制,才能使经济的道德约束激励机制长久有效发挥作用。建构“德—得”相通的理念链条,要“得”必然有“德”,有“德”必然能“得”的价值信念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必须转寻客观公正的制度依托,赋予伦理信念一定的价值生命活力,适时给予主体经济行为一定道德激励性质的伦理补偿和道德回报,以客观制度律令的推行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伦理秩序,使“德—得”相通的道德回报机制成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共识,“道德”转化为“自然”。

(三)转寻个体内在的道德信念,弥补客观制度规范的缺陷性与滞后性

韦伯新教伦理精神以一种宗教道德价值信念的支撑累进,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运转提供了全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意义解释模式的同时,也为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理性实践运行准备了道德价值信念因子的形上规约,即惟有诉诸作为“人”的内在道

德戒律和良知准则,培养个体“慎独”的道德自律意识,专注于社会最基本的底线伦理规约,从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弥补制度本身的不足,依靠这种“善性”的道德价值信念和生活智慧,个体能够不借外力而自身自足完满地存在着应对外部世界的伦理机制。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机制依靠禁欲与节制的“天职”责任提升着新教徒的德性精神境界,完成了独特的个体道德信念的伦理文化设计。然而,当现代化际遇失却了宗教道德价值信念的普遍文化场域时,必须在现世的世俗有限人生中去探寻并培养和塑造道德价值规范的个体道德信念,克服制度“他律”的不完善性,使道德“自律”与之契合,形成道德价值信念支撑的有机文化生态,促进社会伦理文化秩序和谐演进。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文化设计为个体伦理价值信念的“自律”意识的落实准备了制度环境与伦理实践氛围的合理机制,特别是近年来和谐社会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已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和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而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发自主心地接受并恪守道德律令的感召与引导,探寻价值意义世界的真义,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生态”达成,为具体经济运作过程中的物质利益矛盾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提供精神价值信念的实践依托。

[参考文献]

- [1] 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 韦伯思想引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32.
- [2]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钢, 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 [3] 桑红. 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J]. 宁夏社会科学, 1999(4).
- [4] 樊浩. 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历史哲学取向[J]. 伦理学研究, 2004(5): 38.
- [5] 爱德华·罗斯. 社会控制[M]. 秦志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344.

[责任编辑: 王继洲]